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贫困的教育美学/冉铁星著.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ISBN 7-5351-2568-9

I. 贫… I. 冉… III. 教育美学-研究 N. G40-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7491 号

出 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电话:85443735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黄冈日报印刷厂

(438000·黄冈市八一路 7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4 插页 11.25 印张

版 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60 千字

印数:1—2 600

ISBN 7-5351-2568-9/G·2098

定价:17.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目 录

导 言：人类面临的危机与教育美学的生机	(1)
第一章 徘徊一个世纪的“不速之客”	(36)
一、教育美学在中国的兴起和挫折	(36)
二、教育美学的复兴及主要问题	(50)
三、教育美学为何是“不速之客”	(60)
第二章 精神之花与贫瘠之壤的错位	(66)
一、“水中月，镜中花”	(66)
二、“饥肠辘辘”与“忧心忡忡”	(74)
三、理想与现实的双向错位	(81)
四、贫瘠之壤也能培植精神之花	(88)
第三章 美与教育联姻中的误区	(94)
一、说不清道不尽的“美”和“教育美”	(95)
二、“美”及“美学”的语义异同及中西差异	(107)
三、美学与教育融合中的歧误	(119)
第四章 走出方法论的迷宫	(131)
一、传统的经验理性方法的潜行	(131)
二、谁执马克思主义方法之“牛耳”？	(143)
三、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方法”	(156)
四、无边的方法与有效的整合	(167)

第五章 难分难解的教育美学与审美教育	(177)
一、教育美学与审美教育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177)
二、教育美学与审美教育的对象异同	(188)
三、教育美学有无特殊的功能意义	(197)
四、教育美学与审美教育学的方法异同	(206)
第六章 教育美学与宗教	(212)
一、不可忽视的“复兴”背景	(212)
二、“美育代宗教”的由来	(222)
三、教育美学与宗教的内在联系	(233)
四、当代中国人的灵魂与宗教和教育美学	(243)
第七章 教育美学与德育、智育、体育	(249)
一、作为教育的主要构成与教育的哲学基础	(249)
二、教育美学与德育	(258)
三、教育美学与智育	(269)
四、教育美学与体育	(280)
第八章 教育美学理论结构的预设	(287)
一、寻找逻辑起点	(287)
二、试建范畴结构	(299)
三、摆正结构位置	(311)
第九章 走向新世纪的教育美学	(319)
一、新世纪的呼唤	(319)
二、新世纪的教育理念	(329)
三、新世纪教育美学的“立交桥”	(341)
主要参考文献	(352)
后 记	(355)

导言：人类面临的危机与教育美学的生机

—

公元 2000 年是人类历史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它标志着两个千年的结束和第三个千年的到来。在这一世纪交替之际，地球上的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放缓脚步；回眸走过的足迹，省悟所处的境地，前瞻未来的路径。尽管心境有异、眼光不同，但人们仍然会看到一些共同的现象和意义。

恐怕无人对如下判断产生异议：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是迄今为止人类进步最快的一个世纪，科技的飞跃发展，工业的迅速崛起，各国人民生活水平不同程度地提高，发展中国家政治独立，世界多极化格局逐步形成等等。这些辉煌的成就都为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人们引以为自豪。同样无可置疑的是，20 世纪也是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竞争最为激烈而普遍、战争最为惨烈而频繁、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精神家园最为荒芜的百年历史。仅以战争为例，前半个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其规模和残酷程度都是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死亡 5000 万人；后半个世纪已发生 150 多次战争，造成 2000 余万人死于非命。这些又足以使走向新世纪的人类触目惊心。

或许，人们对“双刃剑”或“二律背反”的历史现象因司空见

惯而习以为常了。身处跨世纪的人们可能更容易沉醉于人类智力的结晶——科技及其产品,更容易自觉不自觉地踏入竞争的旋流而不能自拔,却不愿意充当“杞人忧天”的角色,不愿意正视歌舞升平背后隐藏的紧张关系和危机。尽管如此,人性中的自我保护和忧患意识还是不断提醒人们——要正视现实。

自称“着重宣扬某些正面事物”的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也承认:“我们都来自 20 世纪式的黑暗时代,这是一个受工业化和极权主义双重影响并让科学技术干扰我们生活的时代。”^① 面对人们普遍的担忧,他也不能回避新世纪将是善与恶的大混战,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核事故、温室效应是否会使人类文明覆灭呢?化学战争会爆发吗?臭氧层最终会被破坏吗?人类是否面临着一场千年的地狱之火或硫磺石的灾难呢?会有空间飞船来营救吗?世界末日是否会由于生物时代某一基因走上邪路而来到呢?”^②

人们不禁会问:这些与教育美学又有何干系呢?答案要从人的生活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谈起。从 20 世纪总的趋势看,科技与工业的迷信逐渐盛极而衰,人文精神则逐步否极泰来,世界范围内不同程度的艺术复兴和宗教复兴便是表征。当然,“人类并非要抛弃科学,只是要通过宗教复兴,重新肯定精神的力量,使人类能以更为和谐的方式追求美好的生活。”^③ 稍微熟悉美学和教育的人都知道,美是真与善、理性与感性的和谐表现,美的教育是使人学会以和谐的方式追求美好的生活。教育美学则是关于美的教育的基本理论。

这又回到前面探讨的问题,人类现今的生活是否和谐美好呢?

① 《2000 年大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译本,第 7 页。

② ③ 同上,第 302 页。

在我们所处的 20 世纪中,最值得人类骄傲的确实是科学。人们原以为科学可以解释一切,科技可以使人操纵一切,可以带来无穷无尽的财富,可以带来民主、自由,可以使人省去辛劳之苦,等等。可以不确切地说,科学在反对宗教成为胜利者之后,继而取代了宗教的地位,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但是,任何片面的发展都会造成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都会导致事物自身的异化及与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终而转化为畸形的丑。

——科学技术在帮助人类认识、支配客观世界的同时淡化、机械化了人的主观世界。无可置疑,科学技术发掘和延伸了人的智力和手脚等器官,成为人类认识和掌握客观世界的超自然的工具,被誉为“第一生产力”。于是,崇拜科学技术的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科学技术对象和领域的界限,或者说忘记了科学技术功能的局限,试图以科学技术驾驭人的主观世界,让科学精神充斥人的心灵,培养科学情感,等等。20 世纪涌现出五花八门的科学哲学、实证哲学、科学宗教、科学艺术,便是这种努力的某些表现。然而,由于在本体和对象结构上发生了“错位”,其结果只能是“强扭的瓜不甜”,甚至将人的精神误导向无情无义的客观世界。要么是使人轻视、淡化自身的主体性,要么是使人的精神科学化、机器化(日常生活中的“书呆子”、“木头人”,有的便是过分的科学教育的结果)。一句话,不是以科学技术作工具来帮助人文精神大厦的构建,而是用科学技术去解构人文精神大厦,进而取而代之。这就形成人文精神的失落和危机。

——物质生活的无度追求又冷落了精神生活,空虚了心灵世界。为了将大众从唯心主义、唯灵论的愚弄和欺瞒下解救出来,为了说明一个日常而浅显的道理,几个世纪以来的唯物主义者前仆后继,终于让大多数人接受了这样一个真理:人们只有先从事物质生产,保证衣、食、住、行以及繁衍生息,才能够再从事

精神活动,享受精神生活。所以,即便是充满了理想精神的共产主义,为了使之从空想到科学,也必须以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物质生产学说为经济学基础,再以经济为基础构建共产主义大厦。从道理上讲,这没有错;但是在现实不同的条件下,对待物质与精神的态度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在人类历史尚处于温饱问题犹存、生存竞争愈演愈烈的阶段时,人们更容易在世界观上接受物竞天择的自然唯物观,在价值观上倾向于占有名利并满足相应的官能欲求,在人生观上崇尚及时行乐的享乐观。这并不排斥一些重义轻利或舍利取义的方面。但可以肯定地说,在最近的百年里,人们的物欲在总体上超过并战胜了心欲(相当部分是不自觉地陷入了潮流),并酝酿引发不同程度的精神危机。

——世界市场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又加剧了竞争的负面影响和贫富两极分化。世界市场的形成是20世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其深刻意义并不在于范围的扩大,而在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渗透到全球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中,已经或正在形成全球化(一体化)的生活方式。其中的优点及有利因素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人类对于市场过分倚重以致于不得不依赖它,不仅不能驾驭它而是大有被牵着鼻子走的态势。市场实质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此处的“自然”不是指自给自足,而是指不受人为计划控制的,相对客观的自然状态),是供求关系的原始表现和调节工具。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市场关系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产品之间的“生物链”式的生存循环关系;一言以蔽之,是一种动物式的、自然的、非理性的关系。应当指出,在现实中,市场经济已加入了人的有意识的计划、理性的伦理等等因素,已不是纯粹的市场关系。尽管如此,在市场关系中,利益(物质利益为主)是其中的主要驱动力,利己本能是其中的核心

伦理，竞争是基本原则和方法，“强胜弱汰”是主要结果。这种“无为而治”的方式虽然能够激活每个个人的生存竞争力，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迸发出极大的生产力和创造性，但是，缺乏秩序的各个主体的力就会盲目碰撞甚至相互倾轧，引发各种矛盾和争斗，并逐渐酿成危机（近年亚洲的金融危机及其在世界范围的反响便（向人们敲响了警钟）、爆发战争。尽管多极化的格局及其所构成的张力场能够调节缓解部分冲突，但是，根本的矛盾及潜在的危机并未消除。

——知识的高速发展拓展了人类的能力，但“知识爆炸”又使个人变得片面、渺小。据称，近百年的知识产出量超过了此前人类知识的总和。这无疑是件好事，同时也带来了接受和消化巨量知识的问题。尽管不断更新的信息及其贮存技术能够解决知识的存放及形态转换等问题，但能否让这些知识进入教育过程，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和拥有，确实是一个大问题。目前的情形是，随着知识的不断增多，知识的专业分支愈来愈多，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掌握的人越来越少。知识的细微分支导致学习上的分工及职业的分工愈来愈细，“隔行如隔山”的情况逐步发生在原来分工的同一行当中。应当说，知识的分支和职业的分工不断细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由于其他种种原因（如教育机会、经济条件、生理状况等），每个个人面对这种巨大的知识及细致入微的分工，便会感到力不从心，感到不得不听从知识力量的摆布。从人本的意义上说，这便是一种异化的现象，即人类探索得到的客观知识凌驾于个人主体之上，并驱使片面发展的个人成为知识的奴隶。这种片面发展的不断积累、深化，就会逐渐形成人的主体性异化或失落的危机。

——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的突破将使人类智力达到极致，却会使人类本体受到威胁。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在 20 世纪有着

划时代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和高度发达(以“深蓝”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为标志),“克隆”技术的出现,使世界惊呼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信息时代和生物学时代。这两种科学技术确实证明人类是这个星球上的万物之灵长,可以喝令万物为我所用,替代人们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替代人们生产活动乃至自身的生命生产。于是人们隐约感到,人类最危险的敌人便是人类自己。人性中的弱点——好逸恶劳与贪得无厌相结合,便会造就超过自身的物质力量和生命力量。这种潜在的危机已为众多有识之士所意识,而且已被一些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所戒备。但是,人们的好奇心和成就感在巨大的效益配合下,很容易一意孤行,冲破人类理性的防线,极喜欢视畸形为美。所以,厌倦了和谐、追求着极端,便是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反人性表现,也是一种反美学的现象。

——人类征服并企图奴役自然,但其中非理性的行为已通过自然在报复着人类。这是一个极其显明而深刻的矛盾。在人类尚未获得自我意识之时,自然界保持着原始混沌的状态,万物尤其是有机体保持着一种循环的生物链。从美学的角度看,这里面就表现着自然美(如果人代表有自我意识的自然)。随着人的自由、自我意识的产生,人类从自然界中逐步分离、独立出来,人们不仅将自然界视作生存的环境,而且看作抗争的对手。在人类尚无能力扯开自然界的面纱时,人们面对变幻莫测、危机四伏的茫茫宇宙,便不由自主地匍匐在各种自我塑造的神灵面前,并利用神灵尔虞我诈自相残害。一旦奋力摆脱掉宗教的束缚,对自然界(包括人类自身智力)有所发现,有些认识的时候,人们又情不自禁地沉醉于对自然的征服之中,并且忘乎所以地凌驾于自然之上,恣意地耗费自然资源、奴役自然。这两种情况殊途同归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也使人类关系十分紧张。自然界看

似无情物，也无情地回报着人类：臭氧层的破坏，厄尔尼诺现象的日益频繁，世界性的荒漠化，大面积的水资源短缺及洪水无常等等现象，都破坏着人类的生活。总之，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上，和谐的关系一旦被破坏，人与自然便会两败俱伤。

二

过多地谈论危机实在令人感到灰暗。其实，诚如已成公理的二律背反论，凡事都有一利一弊，弊多则积成危机，利多则积善为美。上述危机实际上只是人们在几种重要关系上认识及处理失当，打破了平衡、和谐的状态。难怪法国哲人狄德罗认为“美在关系”。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导致关系失当的原因，便有利于理解为什么要在教育美学这样一个生僻的题目下探讨这样一种突出而常见的问题。

综观上述几种失衡的关系，首要的原因便是没有正确适度地认识和处理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自古以来，唯灵论与唯物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反复争先。每一次交锋本来是纠偏的好事。问题是矫枉过正的目的是为了适中，但人们又往往视过正为正常，便又滑到了另一个极端。

在古代，无论是西方的古希腊时期，还是东方的春秋时代，人类对人自身的意识非常审慎，十分认真。“认识你自己”、“三省吾身”便是东西方不约而同的箴言。苏格拉底将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称为最高的智慧，孔子也深悟到“学而后知不足”。正是在这种对人自身朴素而深刻的认识基础上，才摆正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将人放到“万物之灵长”的主体位置，又将自然视作人的无意识的机体。用中国哲学的话说，便是天人合一。当然，在人类生产力发展对人和自然的意识还十分有限的条件下，人

们并非都有一致的认识,也不是都保持着正常稳定的心态。面对不可预测和把握的自然力,大多数人对自然界怀有一种崇仰和敬畏的心理。为了保持心态平衡与和谐,人们就必须寻找一种可以皈依、获得终极关怀的心灵世界,这便导致以信仰为内核的宗教的产生。通俗地说,在原始的意义上,宗教是人们借助于一种变态、外化的精神力量,追求进入善美合一的理想(美好)世界的一种方式。

正是在人类普遍感到自然力量大于主体力量,天可胜人而人不能胜天的历史背景下,各种宗教在世界范围内生长开来。应该承认,这些宗教的本意是调节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关系,使人类精神的行为趋于善、达于美。但是,随着宗教的功利化、形式化和政治化,宗教本质本身也发生了异化。除了排斥、封杀不符合教义的“真”(客观规律及其认识方式——科学)以外,也机械、刻板地压抑、泯灭正常的人性及其教育,逐步走向“善”和“美”的反面。这一点,在西方的中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

为了纠正被错置的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文精神,一场追寻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浪潮在西方应运而生。这场被称作“文艺复兴”的运动,将人的字母由小写改为大写(与上帝同位),成为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的代名词。然而,文艺复兴者、启蒙运动者以及后来的追随者,在“矫枉”的同时忽视了“过正”,在追求美、真、善的过程中对其中“物极必反”的因素采取了忽略不计的态度。在扫除宗教禁锢的同时,也倾倒入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审美原则。例如,和谐、匀称是美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打破宗教刻板、单调的形式之后,各种丰富多彩的生活及其艺术表现形式令人欢欣鼓舞;但也滋长了一种反和谐、以怪异为美(毋宁说以丑为美)的逆反心理及其反美学现象。最难被人察觉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被用来作为反禁锢、解放人性的重要武器——唯物论和科学,后来

逐步淹没了人的主体地位，成为新的反客为主的崇拜物（物质至上、科学万能）。

唯物论本是反对宗教唯灵论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将神性返还为人性的过程中，唯物论居功至伟。它将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物质性和客观性揭示出来，尤其是将人的精神现象的物质根源寻找出来，这就使精神无秘密可言，使神灵无处立足，使人性与动物性自然还原并统一到自然性。于是，人从神那里解脱出来，从天国回到地面。接下来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的度。可能由于惯性的作用和历史的条件限制，唯物论向机械的方向发展，以致于将人等同于动物、植物乃至机器。于是，在社会生活中，人把人视作物质或商品的情况，便日益增多、习以为常，拜物教、拜金主义的产生也不足为奇了。

科学，本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是人类智慧的骄子。在把人从神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中，科学向神证实了人的力量，把人从奴隶的位置移到了主人的地位。人们始料不及的是，科学本身无善美理性，在某些方面，如物质力量方面也有超过人的潜力。现实已经表明，科学的片面发展助长了人类的物质追求及享乐欲，削弱了人对自己的本质尤其是精神的认识和应有需求，打破了人自身心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及和谐。科学万能、科学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奴役人的工具或力量，部分地使人丧失了主体地位。当然，这并非科学自身的过错，而是人类理性的失调、非理性的失控所致，即过度片面地追求真，而忽视了善、美，错乱了真、善、美本身和谐的关系。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不能不提及的是仍有人致力于协调其中的关系。比较突出的便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及其批判继承者马克思。康德从研究自然科学入手，然后研究哲学、伦理学、美学和教育学。他的著名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

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一般被认为是各自独立的哲学、伦理学和美学著作，实质上是针对人性的主要方面——知、意、情——而展开的系统研究。其中，《判断力批判》著于晚年（1790年），它相对于前两个《批判》有着特殊的意义。按照朱光潜先生的看法，《纯粹理性批判》只涉及知解力（知性）和自然界的必然，《实践理性批判》只论及道德理性和精神界的自由，自然界的秩序和精神界的秩序各成一体、漠不相关，二者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人的道德理想必须在自然界中才能实现，精神界的道德秩序必须符合自然界的秩序。因此，必须寻找一条沟通二者的现实途径。经过长期探索，康德终于找到理性（含知性和道德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桥梁——判断力。用通俗的话说，美感本身就是真与善的统一在主体情感上的体现（主观符合客观的目的性）。在审美活动中，既反映出自然界的必然，又表现出精神界的自由。所以，美可以融和真与善，成为“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并且确立了人在其中的主体地位。

黑格尔基本承袭了康德的学说，只是更完备地构造了理念及其辩证展开的庞大体系。他的逻辑学、伦理学、美学也是以其多层次的“正——反——合”为系统结构，不断地在辩证法操纵下演绎和发展，成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念及范畴体系。同理，真与善在主体身上的融和就是必然到自由的具体表现，也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就是美。所以黑格尔不无自豪地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特性。

马克思将黑格尔的理念历史倒了个身，将物种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统一到“美的规律”上，将劳动（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蕴含或表现的美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这里，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然客观的力量是吻合的，人的尺度本身也是物的尺度之一（抑或说人的尺度是物质尺度的典型表现）。所以，主体和客

体、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在审美实践中是统一的。马克思的实践美学观进一步从现实性上解决了沟通和融和的问题。然而在一些后继者那里,这种实践美学观没有受到重视,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到唯物论上,并简单地演变到决定论,片面地认为强调主体就是唯心论。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体精神旁落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和美学之外。

除了本体论上的原因之外,思维方式和方法上的片面性、极端性和情绪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客体与主体、物质与精神、科技与人文、集体与个体等等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是否适当,在思维方式上首先要看有无系统及中和的观念。

长期以来,人们受生存竞争特别是战争的影响,容易并习惯于把一个事物的两个相对(矛盾)的方面看作敌对面,如果加上国家、民族、阶级、集团、家庭乃至个人的“非此即彼”的立场观,便形成了“你死我活”的紧张关系。这种片面狭隘的思维方式往往认定两个方面的一面,形成门户之见,并固执己见,拒斥他人。如果这种片面之见加上某种权力或权威,就形成了意识形态的“霸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说每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定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中国历史上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西方历史上的征伐异教徒的战争,都是片面选择。实质上,真、善、美是人类普遍的价值系统,只是因为人类的意识能力有限,只能在无限的无序的“全息”系统中发现有限的、有序的和谐和自由秩序。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处于不同生理条件、教育环境或社会关系中的人就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发现各自的“新大陆”。尽管如此,各种特殊性必然蕴含并体现着普遍性。所以,和谐、自由的秩序(关系)就不同程度地表现着全面性,或者说是人的相对的全面发展的体现。

另一个简单而普遍的思维方法是好上加好、精益求精、追求无度。不能简单地说这一思维方法是错误的。在绝对的意义上，人总是追求无限的发展和美好的理想；在相对的意义，人们总想把手头的具体事做得完美。这两种想法均不为过。难于意识和把握的是，在无限循环发展的事物链中，具体的事物都有相对的绝对，即我们常说的“度”；过了这个“度”，便不是这个事物，而是另外一种事物了。如果说好上加好、精益求精只是限于某个事物的“度”，那就是追求完美，达到的标志便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自觉或不自觉地超过了“度”，从客观上说就是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从主观上说便是好心办坏事、吃力不讨好。例如，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都是好东西，但它们的应用范围都有一定的限度，不能用唯物论代替所有的哲学甚至其他的科学方法论，也不能用自然科学代替人文学科；否则就会造成片面、破坏平衡、打破和谐、带来冲突。尤其是科学这个东西，理论上的表现是客观规律、是真理，现实上的表现是高效益的产品，是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有效工具。掌握了科学，不仅掌握了自然界，而且操纵了社会竞争的主动权；先进就可以打人，落后就要挨打。因而，只要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便会争先恐后地追求科学，便会认为多多益善，甚至不惜牺牲其他乃至生命本身的意义，让科学凌驾于一切之上。

还有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明明感到是非理性或陷于非理性的处境，却仍然乐此不疲、知迷不返。这在情爱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如情人眼里出西施、情有独钟、单相思以及以身殉情等等。在我们讨论的几种重大关系的失衡中，非理性也同时隐时现。例如，对某一种主张或时尚引起心理上的共鸣之后，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大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架势。当科学家证明地球围着太阳转的时候，宗教徒怎么也不愿意承认，并置

科学家于死地而后快；而当宗教不灭的事实证明科学不是万能的药方、不能医治人们的精神创伤、建立人们的心灵家园时，科学崇拜者怎么也难以接受这一判断，并力图让科学主义渗透于宗教等社会领域成为主宰。这其中，理智和情感、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多情况下，情感左右着理智、非理性拖拽着理性而“跟着感觉走”。这便是思维方式和方法上的情绪化。同样，我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简简单单地否定情绪或情感；因为审美的特征就是情感。回过头来反思一下，人类将大量的智力、精力投入到物质世界等人的对象研究上，对人自身的研究多在生物医学的层面和人际关系上下功夫，而对人的精神现象方面的哲学、宗教、美学等等研究不够深；至于情感，则因为其既难把握又渗透于行为等方面而更少研究。（精神分析在心理研究中偏向于情感，但仍未将情感作中心对象）当有人唱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时，我们在感情上可能产生共振或共鸣，但理智上却茫然无知。如果说知性、道德理性都属于人类理性的范畴，那么，情感就尚属于非理性（不是反理性），而非理性的作用是万不可小视的。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人类理性能否在人类行为中占居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在非理性的认同和支持下转化为实践理性。

从根本上说，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人类自身本质力量的发展水平，制约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物质与精神、科学与人文等协调发展。首先，世界各国、各地区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物质生产水平不平衡，两极相差悬殊。这本身就构成了经济、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也使人的自身发展条件不平衡。其次，文化教育受经济、政治的影响难以按美好的理想计划去实施。例如，从量的方面看，世界上有较多的人口不能得到基本的义务教育；从质的方面说，教育目标内容的结构不合理（未达到和谐的美）已是世界

性的难题,因就业竞争而导致升学竞争又为素质教育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使教育成为畸形、不美的教育。仅仅是以上两点,就制约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多方面(尚不说全面)协调发展。马克思早就有这样一种思想,人化的自然(环境)是否能依照“美的规律”去塑造,关键要看主体的人是否具备自由的、美的意识,即“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具有深刻的感受力的丰富的、全面的人”。^① 这就是说,对象如何成为人的对象,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应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例如,耳朵与眼睛对对象的感受就不同。对于耳朵来说,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因为耳朵还不具备与对象相应的本质力量。同理,最美的景色对于忧心忡忡的穷人来说也是索然无味的。因此,人的自身本质力量的发展条件是制约对象的真和主体的善、美达到和谐一致的重要因素。

三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行为是有意志支配的行为。既然我们已经发觉人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在几种重大关系上没有能够有理性地加以协调,以便达到真、善、美大体和谐的状态,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失调的状态有任其发展和恶化的趋势,那么就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诊断危机的病因,开出对症的处方。

平心而论,地球上的各种国际组织、各个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各种集团和群体,乃至各个家庭及个人,都在为应对和解决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译本,第80页。